

论河图洛书作为一种元符号

黎世珍

摘要：河图洛书的嬗变史，与一般的符号化过程有很大不同，因为它是典型的意义先行，图像后出。这一特殊性能够成立，主要基于河图洛书是一个包容面极广，通约度极高，并有着强烈传承性、地域性的元符号。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对宇宙规律的认识是河图洛书成为元符号的主要原因，体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天命和宇宙规律认识的努力，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关键词：河图洛书，元符号，宇宙，无限衍义

An Analysis about *Hetu Luoshu* as a Kind of Meta-sign

Li Shizhen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hetu luoshu* differed from the general process of symbolic evolution because its significance arose before its image. This particularity is due to the highly comprehensive and highly commensurable nature of *hetu luoshu* as a meta-sign. *Hetu luoshu* also functions as a kind of regulatory meta-sign with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regionality. Animism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of cosmic law, which reflect the efforts made by people throughout history to understand destiny and cosmic law, as well as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national culture,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etu luoshu* as a meta-sign.

Keywords: *hetu luoshu*, meta-sign, cosmic law, infinite semiosis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2011

一、关于河图洛书的演变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比较特殊：嬗变中的河图洛书如何成为一个元符号。

“河图”一词最早见于文献《尚书》：“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阮元刻，1997，p. 239）后人猜测这里的河图是典册、玉石等，说法不一。根据语境分析，河图出现在康王继位之时，并与大玉、夷玉、天球并至，因此能确定一点，河图具有美好、祥瑞之意。

先秦时期，人们一直寄寓河图祥瑞之意，《论语》曰：“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句后朱熹注：“夫，音扶。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已，止也。”（朱熹，2006，p. 142）孔子将河图的再现看作圣王出现的象征，朱熹将河图看作圣王之瑞。“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是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发出的叹息。

《论语》提到了河图，但是未提洛书。将河图洛书并提要归功于《周易》，我国古代第一部哲学专著，其载：“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阮元刻，1997，p. 82）此处将河图洛书看成一种天生神物，圣人创制《周易》的道理和原则需部分效仿于它。此后，洛书逐渐与河图并提。

这时期关于河图洛书较为权威经典的文本除了《论语》《周易》，还有《礼记》《墨子》和《管子》。《管子·小匡》记载：“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去诸侯乎？”这些经典文本不约而同地将河图洛书视为祥瑞之兆。所谓“兆”，是古代占验吉凶时灼龟甲所成的裂纹，指向事物发生前的征候或迹象。这种祥瑞之意自有记载可追寻的先秦始，历经两汉、宋、清等朝代，一直保存并延续。不少文学作品更是借用河图洛书来表达对太平、祥瑞的向往和企盼，唐代苏颋在《奉和圣制途次旧居应制》中道：“盛业铭汾鼎，昌期应洛书。愿陪歌赋末，留比蜀相如。”诗人将洛书与象征国祚的宝鼎对应，以期盼太平和祥瑞。宋以后，祥瑞之意虽不再是主流，但依然不断被提及。

基于此，这时期河图洛书的意义被解释为先民广泛接受的天降祥瑞，与太平盛世、政治亨通的期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个意义在不断的传承中获得了稳定性和有效性。河图洛书与文化繁荣、盛世太平、政治清明这一切

祥瑞之期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清楚，但是其祥瑞的意义内涵不容否定。这一文化心理持续发酵，造成以后对河图洛书认识的再累加或延伸。河图洛书是否真的存在，是否有具体的物质载体，已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河图洛书作为一个祥瑞的隐匿之物藏于人们的内心结构之中，早已经成为一个集体的符号。这一符号的解释落在祥瑞的范畴之内，代表人们完全依赖土地、固守家园的精神取向，是人们“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一种心理安慰，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

与此类似的还有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一样是集体行动，在中国人的图腾崇拜中，动物崇拜（龙马、凤凰、麒麟等）历史悠久，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它们的崇敬，以祈求在温饱、安全、种族繁衍上获得神奇的力量。因此，图腾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符号。人们不会追究凤凰、麒麟存在的真实性，只会信任这些约定俗成的落在一定解释之内的符号，继续着古老家园和美好的联想。

无论是河图洛书，还是图腾崇拜，它们实质上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是群体对现实印象作出的反映，是一种集体文化符号，亦是一种调节性的符号，它们的指称范围一开始就已经被固定好，并有强烈的传承性和地域性。

汉代之后，河图洛书进入第二个阶段，迎来了第一次嬗变高峰。

先秦时期出现的祥瑞之意尚存，《汉书·公孙弘传》：“德佩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班固，2007，p. 587）此处的河图洛书祥瑞之意明显。但河图洛书在此时期并没有执守祥瑞这一稳固含义，谶纬图书便是对河图洛书的累加解释。

汉代谶纬图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儒家七种经典著作（《易经》《尚书》《礼经》《诗经》《春秋》《孝经》《乐经》）进行附会的纬书，称为“七经纬”；另一部分则是以河图洛书命名的纬书。这些纬书之中有大量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颇具神话色彩。“伏羲氏王天下，有神龙负图出于黄河。”（《龙鱼河图》）；“天大雾三日，黄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蘸之。天乃大雨七日七夜，鱼流而得河图”（《河图■运法》）。（安居香山、中村璋八，1994，pp. 1149-1166）这些表述具有同样的记述方式和神话思维的描述，在其他纬书中也是俯拾即是：“河龙洛图龟书，圣人受道真图者也”（《易纬是类谋》）；“唐帝游河渚，赤龙负图以出。图赤色如锦状，赤玉为匣，白玉为检，黄珠为泥，元玉为鉴”（《春秋元命苞》）。

这一时期谶纬图书中河图洛书意义极为丰富，并以河图洛书为蓝本衍生出不少神话故事，甚至还对河图洛书的形状外貌作了不少描述，因关于河图

洛书的记载并非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具体内容驳杂。不过纬书中的大多数河图洛书神话都是政治神话，多次将河图洛书与伏羲、黄帝等古代圣王并提，描述了不少关于圣王受图的情节，意为河图洛书是神权天授，不可剥夺，早到远古黄帝、尧、舜，近到秦始皇、汉高祖，无一例外都是受图而登大位者。

很明显，汉代讖纬图书中的河图洛书是权力之象征、政治之符号，权力是政治神话叙述的核心。河图洛书如此单调、重复、不变地强调君王受图的必要性，便沦为宣扬天命思想的工具。与先秦时期作为祥瑞的河图洛书相比，汉代讖纬图书中的河图洛书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是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河图洛书在第二阶段的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诉求，它作为政治神话中的祥瑞出现并非偶然，这种和政治相连的新思维只是对初始意义的借用。先秦时期的河图洛书已经具有祥瑞的意味，后来演变成如此具有政治神话色彩的意象，则是汉代人的新创作，因为他们借用的只是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的意义，或单单是其名词本身，内容相干程度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另外，将河图洛书看作八卦九畴更是汉代人的另一种新发明。

至宋代，河图洛书发展进入嬗变的第二个高峰，亦即其第三个阶段，这也可以说是意义的重大转型时期，因为河图洛书终于迎来了具体的图像。有像时代的到来，证明宋人对河图洛书的认识完全搁置了河图洛书的原初意义。当然，宋人对于河图洛书的认识也出现过巨大争议，并形成不同流派，分别是“图书派”与“疑古派”，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图书派”，他们纷纷绘制河图洛书，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一至十排列的河图（图1），和以一至九排列的洛书（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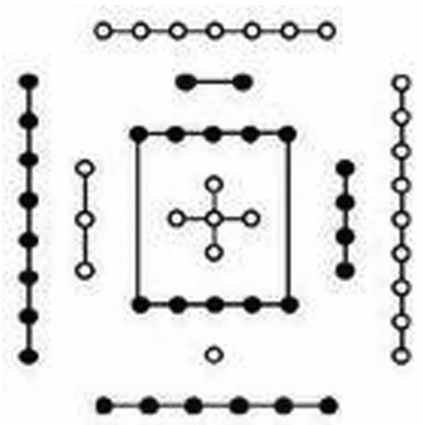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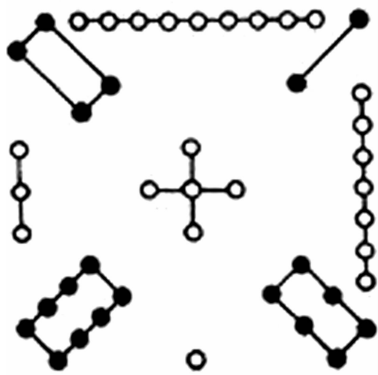


图 2

朱熹更是在《易学启蒙》卷首附河图洛书这两张图，遵循邵雍一派的观点，以一至十排列为河图，以一至九排列为洛书。行文中，朱熹根据这两幅图解释出许多新的意义，如河图洛书所包含的阴阳五行原理及成数概念。后人根据这两幅图，在文字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又解释出了新的意义，因为图形作为一种直观可感的存在更容易与外界产生意义共鸣。

纵观河图洛书的演变史，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诞生了：从先秦时期开始，直至宋代，河图洛书的意义几乎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宋代之前，河图洛书没有具体图像，甚至连确切的物质载体也难以确定，因此得不到“形式直观”（赵毅衡，2015）。宋代之后，河图洛书出现了具体的图像，这种意义先行，图像后出的模式与一般的符号化过程很不相同。河图洛书直接跳过了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这是河图洛书的特殊之处。其原因为何？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二、作为元符号的河图洛书

（一）元符号之“元”

“元”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早在《周易》便出现，“乾，元亨利贞”“《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近人高亨、李镜池等训“元”为大，意为古人在占卜时若能卜得此卦，即乾卦，便可举行大亨之祭。这一例让人想到元语言中的层控关系，乾卦是六十四卦之首，按序列排位自然是第一位，初始之位，与后面的卦象不在同一个范畴，具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大吉之象都在此中。层控关系是元语言的根本不同，在元符号之中，这种层控并不十分明显，或者说没有强烈要求必须是层控关系，因为元符号再度使用的只是符号的某种形式。据此，《周易》之中的“元”的意思是要表明万物肇始、元始之序列，延伸开来则是规律的开始和探讨，已经有了“元”的意味，但是不足。

与“元”的意识萌芽较早不同的是，元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是一个滞后的领域。讨论之前，至少首先要清楚，何为“元”？“元”（meta-）这个前缀，原是希腊文‘在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文集最早的编者安德罗尼库斯把哲学卷放在自然卷之后，名之为“Metaphysics”。由于哲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科学深层规律的探讨，因此“meta-”这个前缀具有了新的含义，指对规律的探讨，简单来说，“关于X的X，称为‘元X’”。如果按照这个简单的公式来推理，那么元符号就是“关于符号的符号”。赵毅衡认为“符号就是意义，无符

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所以元符号就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再现的再次再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中有精彩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后来我们借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调侃别人，代替说这个人没见过世面，出尽洋相。名著中的桥段已经是一个符号，也就是意义再现，为了追求生动的表现，生活中的人们借此来调侃某个朋友，调侃某个电影人物，说“你就是刘姥姥”“别学刘姥姥”。这种意义再现的再次再现可以是意义上的延伸，也可以是承接原意。

意义延伸并不是衡量元符号的硬性标准，因为元符号注重的是对符号的再度使用，至于符号原初携带何种意义，并不是元符号之所以成为元符号的必要条件。

例如古典文学中的“狐狸精”，中国古典文学向来擅长描写山精野怪、狐灵鬼怪一类，在这一众精怪中，狐狸精的故事可谓算得上是一个庞大的分支。汉代时，狐狸精或九尾狐地位尊贵，汉代雕塑中亦有以九尾狐示祥瑞者，多持褒扬态度。《山海经》中记载的九尾狐能以人为食，往往昏庸的亡国之君和美丽的狐狸精是绝配。自志怪小说流行以来，狐狸精的形象越发多姿多彩，有的狐狸精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随意转换性别，人们逐渐喜欢将狐狸精和女人联系起来。唐传奇中，便有不少狐狸精变为女人来引诱男子的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是描写狐狸精的集大成之作，他笔下的狐狸精千人千面，并不拘泥于前人对狐狸精一成不变的看法。至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狐狸精的认识局限于有几分姿色，插足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狐狸精”为何能成为一个元符号？因为它拥有这一系列符号的共同点（“女性”），正是这一特征维系了其符号衍义的漫长过程，至于内容相干程度倒是其次。这解释了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何一个如此类似的名词或者意象在历经时间和空间之后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又有某些联系。

所以，元符号之“元”与元语言、元历史、元小说、元广告、元批评之“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强调某种形式上或内容上的联系，后者则强调层控关系。

（二）河图洛书如何成为元符号

河图洛书在先秦时期只是祥瑞之兆，人们在自然灾害频发、君王昏庸、政治混乱之时渴望河图洛书的降临，在长期的社群经验里，只要河图洛书出现，祥瑞必将降临，人们的灾祸必会免除。汉代以后，河图洛书增添了新的

意义，成为讖纬图书、八卦九畴，讖纬图书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离奇的神话故事。宋代以后，河图洛书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具体图像的两幅图，经过不同的解释，这两幅图在风水、医学、数学、汉字学、天文学等领域得到了不一样的解释，并以此延续下去。直至今天，人们对河图洛书的印象多停留于宋代以后出的两幅图上。

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演变过程十分特殊，因为它直接跳过了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赵毅衡将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称为“形式直观”，所谓初始，就是第一步，即皮尔斯所谓的“第一性”。（皮尔斯认为符号表意分为三个阶段：符号的“第一性”是暂时的、直观的，如图像、声音这些直观印象；符号的“第二性”是对这些声音、图像的感知，比如解释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符号的“第三性”是对这些图像、声音的判断、理解等一系列意义深化。）到宋代，河图洛书直观的“第一性”终于出现。其意义先行，图像后出的重要原因是河图洛书是一个元符号，元符号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维系这些新出的符号。明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河图洛书从产生之日起，为何一再演变，并在演变的过程中有时承载着完全不相关的意义，结果依然形成一条完整的发展演变脉络。

究竟河图洛书有什么一贯的规律和特征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元符号？

王卡认为：“黑白点河图、洛书，是根据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而创作的两个数字排列组合图……这两个数字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是汉人宇宙生成论哲学观念的产物。”（朱伯昆，2004，p.283）根据他的意思，宋代后的河图洛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因为宋代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对宇宙规律的认识。这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至少说明了河图洛书在嬗变中的关联。

宋代之前的河图洛书多被解释为一种祥瑞，成解释为八卦九畴。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经验升华至虚幻的精神世界最主要的原因是万物有灵的信仰；另一方面，不断地强调河图洛书与八卦的关系，是对数理知识、宇宙运行规律认识的启蒙。宋代以后出现的河图洛书的基本图式，当是对宇宙规律认识的总结。因此，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对宇宙规律的认识可以看作河图洛书的一贯特征，也是其成为元符号的主要原因，它直接指向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天命和宇宙规律认识的努力。

随之而来的不可忽略的问题是，河图洛书作为元符号与无限衍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因为河图洛书是在无限衍义的过程中，建立起各个符号之间关系的。

（三）无限衍义

皮尔斯从解释项（即上文所说“第三性”）中推出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 艾柯称为 unlimited semiosis)。赵毅衡在《符号学》一书中将皮尔斯这个重要的概念用平易的语言解释：(1) 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另一个是解释项；(2) 解释项是“指涉同一个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需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3) 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绵延以致无穷，因此我们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2012, p. 105)

本文认为元符号的实质接近于无限衍义。河图洛书的嬗变过程，从最初的祥瑞，到后来的讖纬图书、八卦九畴、两幅图像，是一个完整的符号化过程，亦可以说是河图洛书的无限衍义。这样的推论让我们骇然地发现文化是符号、人类是符号，而符号与元符号之间又没有如此界限分明，那么，元符号就和符号一样清晰地存在着。当然，元符号和无限衍义一样，能找到许多通向未来的门径，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领域之中，元符号能散发出灼灼光芒。

符号经过无限衍义之后，对于执意要追溯符号原初意义的人来说，他们几乎是遇到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句话说，元符号化的过程往往只注重解释本身，符号原初意义可能被携带，也可能被悬置。

河图洛书原本只是祥瑞的象征，后历经朝代的演变，直至今日，再回首今日的河图洛书与原初的河图洛书时，会发现其内质已经演变得完全不一样。元符号失去原初符号的意义，这个过程很可能是一个意义断裂的过程，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时候无法追寻到符号的原初意义。艾柯在无限衍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封闭漂流”(hermetic drift)，认为符号的无限衍义漫无边际，我们不一定必须去追溯符号的原初意义，况且符号的无限衍义之中并不定都是累加解释，也有打破固有符号意义而不断去创建新符号的可能，因此，追溯符号原初意义只能是徒劳。“封闭漂流”很适合用来解释元符号。元符号过程往往复杂无比，元符号很有可能只是继承了符号的某种微小特性和形式，即使追溯，也很难发现痕迹。

除此之外，在元符号过程之中起作用的还有解释者，或者说接受者。接受者的能力、地域、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都会使得符号各解释南辕北辙，符号表意活动很可能就终止在某处，或又有新的延伸。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自由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嗅觉敏锐的作家在接受这一符号的同时又创造新的符号，以此来表现他们心中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郁达夫用银灰色、沉沦、消极，袒露自己的反叛；鲁迅用超人式的激情、莫罗式的叛逆，来打破沉闷的社会；郭沫若用喷薄的情感、天狗式的

咆哮，来洗清旧观念……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何时停止，何时继续，都变成了潜在的可能。

河图洛书从出现至今日，已经在符号之间经历过无数次转换，有无限衍义，也有意义断裂，原初符号的意义也极有可能被悬置。但是，正如元符号本身的存在一样，我们需要解释的并不是符号背后的规则，而是解释本身。

三、结论

河图洛书是一个包容面极广、通约度极高的元符号。除了以上所列举的解释，河图洛书还被认为与河洛文化、中原文明有紧密的联系，和中国古老的太极图相比亦毫不逊色。在多种意义活动中，河图洛书或代表祥瑞，或是政治神话中的君王受命之物，或是两幅统会阴阳、内涵深刻的图像，或是河洛文化的证明……这是河图洛书作为一个元符号的力量。河图洛书的自然神秘品性，注定打破常规，呈现出解释的多种可能，与此相关的所有符号意义活动的集合，则反映了这个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河图洛书是一个元符号，也便是一个线索，它在不同时代所携带的不同意义，是一种文化积累，亦体现出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方式。

引用文献：

-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1994）. 纬书集成.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班固（2007）. 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阮元刻（1997）. 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熹（2006）. 四书章句集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毅衡（2012）.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5）. 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 文艺研究，1，18—26.
朱伯昆（2004）. 周易通释. 北京：昆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黎世珍，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中国符号学遗产。

Author:

Li Shizhen,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and semiotics heritage of China.

Email: 1575807189@qq.com